书海泛舟

中国古代官员的休假与读书

□岳 亮

中国古代官员大多自幼熟读经、史、子、集，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后入朝为官，实现个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由于长年读书的习惯使然，大凡为官者皆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期间也依然手不释卷。

古代官员的正式休假约始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政府官员每工作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沐浴一天，称为“休沐”。唐《初学记》载：“休假亦曰休沐。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代官员日常办公和生活必须留居官署，只有在休假时才可抛开政务读书，阅读的范围涵盖诸子百家经典。汉武帝时将是否通达儒学看作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读书入仕实现崇高政治理想成为汉代儒家读书人的最高追求，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备受皇帝器重。除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汉代官员闲时争相阅读的则是一本《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盖因汉以“孝”治天下，政府选官用吏也以“孝廉”来衡量。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行宝典《孝经》奉为休假必修课。

唐代延续汉时的休假制度，刘禹锡曾有诗曰：“五日思归沐，三春羡众还。”随着封建官僚体制的巩固和完善，唐政府一方面将百官的休假由“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一休的“旬休”，另一方面，动不动就给官员放长假，既有给假七天的元旦、冬至、清明三个“黄金周”，还有给假三天的中秋、夏至、腊日，至于给假一天的节日则多达二十余个。唐代的休假繁多，无疑是官员文士的福音。官员们往往选择寄情自然，在山水田园中饮酒唱和，吟诗作赋，无形中推动了唐代山水田园诗和散文的发展，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即为唐代山水田园散文的代表。盛唐时期，社会普遍存在着一股好学之风，朝野上下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晚年任大唐组织部长的大文学家韩愈也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而中唐时代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城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偷偷读官书，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则堪称官员读书的“励志哥”。

宋代的休假制度更为完善。法定的春节、元宵各放七天，加起来接近半个月，紧接着是为纪念赵氏先祖的两个国忌日各放三天，然后是冬至放假七天，旋即又遇天庆节放假七天，这样前前后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春假就诞生了。地方公务加上年终“封印”停止办公的特殊福利，一年下来竟然可以带薪休假一百二十多天。宋代君臣假期读书之风氛围浓厚，宋太宗和真宗尤爱读史书，史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真宗“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至于一代名相赵普、范仲淹等，则更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元人脱脱所著《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宋代官员不仅喜欢读书，有的也将自己为官理政的经验写成书公开出版，如南宋司法干部宋慈撰写的《洗冤集录》可谓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之作。但宋代过多的节假，不免使得官员队伍涣散，影响工作效率。为此龙图阁学士包拯专门给宋仁宗上了道奏折，建议中央削减七天长假，同时要求官员在休假期间熟读经典，体察民生。

明代较之前朝逐渐减少乃至取消了“旬休”制度，官员的全年休假压缩至五十多天，唯有一个特殊群体庶吉士不受影响。庶吉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讲解经籍，是大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享受“五天一沐”的古假。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将元宵放假增至十天，官员可休养生息不奏朝事，民间的放灯饮酒作乐也不干涉，以此“永为定例”。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图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格外受帝王的青睐。朱元璋时期免除了书籍税，朱棣亦指出：“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永乐四年朱棣动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集古今图书八千余种，历时六年编成11095册、3.7亿字的《永乐大典》，堪称中华文化一大贡献。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明代刻书业发达，书市繁荣，尤以帝京云集天下书商，书市之大，书籍之全，他处无一可比。而明代官员亦以淘书、刻书为官员休假之一乐，举凡科举考试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明代虽然节假减少，但官员士大夫休假期间的社会交往频繁，这种社会交往又常常与读书讲学，讽议时政相关。官员因政治立场观点而群聚纵谈，品评人物，裁量政治是非，于是形成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舆论，这种舆论由于是众人共同商议讨论的结果，能对朝政施以影响，是以称之为“清议”或者“公议”。万历年间，以顾宪成为精神领袖的一些文官经常利用休假在无锡东林书院读书讲学，议论时政。顾宪成为东林书院题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朝士有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清代的休假制度在承袭明代的基础上，以封印休假的方式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连缀，前后也有一个月时间。每至封印之日，京城前门一带“万骑齐发，拥挤非常，园馆居楼，均无隙地矣”。官员往往借假日相邀而聚，以诗会友，品评文章。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地方县令皆流行玩一种名曰曲水流觞的高雅游戏。一群人围坐水渠两旁，在上流放置盛酒的杯子，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即兴赋诗饮酒。和珅蒙宠时就特意将自家宅院一处亭子开渠作此游戏用。随着新航路开辟，欧洲主要国家频频向东方派出使团和传教士，一些具有开明意识的清朝官员大量搜集阅读西方书籍，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历史地理。在这方面，康熙皇帝无疑作出了表率。他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光学等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下令将《几何原理》译成满汉文字发给官员学习。及至甲午一役，清朝的官员们终于从虚骄的醉梦中惊醒。于是士林争讲西学，官吏竞言新法成为政界的新常态。官员们在政务之余又多了一项内容——读书开会。当其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士人发起的强学会、保国会等新式学会，以学术为手段，主张新法，倡言变革。康有为“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与开会之故，明者日众”。沈增植、李鸿藻、翁同龢、袁世凯、张之洞等朝中大员皆予支持。《申报》载“康有为倡设保国会结党三百数十人，皆系宦途”，足见官员入会之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式学会接受西方七日一星期及星期日休假之习惯，一般选择在星期日开展读书阅报和讲学活动等事务，反倒成为中国采行此一休假习惯的推动者。如湖南长沙由谭嗣同、熊希龄发起的南学会负责联络全省官绅读书讲学，每七日集会演讲一次，每集会听者数千人，“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官员的休假制度始自汉代，唐宋时期最为繁盛宽松，至明清之际官方逐渐收紧休假政策。这既与国家政权随着社会发展对社会事务治理的承载日趋沉重相关，又是专制皇权下严格控制官吏的形势使然。而官员们在休假期间的普遍读书习惯，熟读典籍，体察民情，调养身体，则是一个悠久的良性传统。

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

——领导干部主题征文启事

中共中央党校是培训轮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每年，大批在职高中级领导干部以学员身份汇聚于此学习提高，这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举措，关乎党和国家的长远大计。

许多领导干部通过在中央党校学习，增强了使命感紧迫感，强化了问题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把握了基本理论，开拓了世界眼光，提升了能力素质。为了进一步推动学习型政党建设，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适应新常态、提高新本领，《学习时报》特举办“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主题征文活动。本次活动主要面向正在或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具体事项如下：

体裁字数：议论文叙述文等文体均可，一般不超过6000字。

内容要求：1.作品必须为作者真实的体会和收获；

2.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征稿时间：见报即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以邮戳为准）。

征文评选：征文截稿后，本报将评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获奖文章将在《学习时报》及中央党校报刊社其他媒体选登。优秀文章还将结集出版，相关图书向全国副省级以上党校等单位赠送。本次征文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投稿方式：

1.征文请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央党校南院报刊社 邮政编码：100091

2.通过邮件发送至：xuexishibao99@163.com

联系人（收件人）：李少军

联系电话：010—62806049

书而思

历史上的几则《劝学篇》

□胡昌方

提起《劝学篇》，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荀子。没错，古今广为流传的当然要数荀子的《劝学篇》了。

荀子，乃战国时期儒家大师，《劝学》是他为学生撰写的一篇讲义。在文章中，荀子以生动形象的譬喻，循循善诱地阐述了知识的重要与学习的方法。他认为：“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终乎为圣人。”要达到此境界，就必须循序渐进，锲而不舍地坚持学习。

其实，除了荀子的《劝学篇》外，历史上还有两则不少人都知道的“劝学篇”，这就是颜之推的《勉学篇》和张之洞的《劝学篇》。

颜之推，南北朝时北齐人，曾任黄门侍郎。他认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唯“有学术者触地而安”。在这种知识便是财富的思想支配下，他撰写《勉学篇》作为家训传于子孙。由于“勉”与“劝”在古汉语中同义，故亦被人称为《劝学篇》。

文中说：“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之推还认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只有把书读好，是最靠得住的。”他“知读晓书”“触地而安”的观念，不失为今人读书治学的明鉴。

以一句“读书贵博、贵精、尤贵通”的箴言而享名的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写过一本小册子，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在当时意指传承先贤“纲常伦理”，而“西学为用”，则是要以西方进步思想为我所用。张之洞还主张“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为此，他还罗列出一长串青少年必读书目。

张之洞作为开明的“洋务派”，并不像早期洋务派那样因循守旧，相反他却规劝国人：要强国富民，就必须大胆地借鉴外国的文化与教育，因为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以己为体，以人为用”。

除了上述三则“劝学篇”外，历史上还有两则“劝学篇”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尸佼，战国时人，他所著的《尸子》中也有《劝学》篇。《尸子》一书虽已佚，但唐代魏征等人编撰的《群书治要》第36卷中还辑录有尸佼文章13篇，而《劝学》篇即列在其首。尸佼告诉人们：材料是好材料，工匠是好工匠，而做出的剑倘不磨砺，其锋刃还是不利。以磨砺譬学，学习的重要性自见。而更可贵的是，尸佼将学习与自身的德行联系起来，并指出德行更为重要的是“无爵而贵，不禄而尊”。同时，他对当时有些人那种“贵爵列而贱德行”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另外，东汉后期进步思想家王符，在其著名的《潜夫论》中，首列了一篇《赞学》。这“赞学”，也是“劝学”“勖勉”的意思。王符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当然，王符等人所强调的学，主要是学书本、学“经典”。因为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强调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

当下，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中，在求知识、攻术业、修德行的具体实践中，重温一下历史上的这些“劝学篇”，想必大有裨益。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厉以宁

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市场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已为时过晚，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即使认识到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已产生的弊病，想避免它们，但需要大笔公共投资，往往力所不及。结果，无论在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

在某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率高达90%以上。在经过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城市化率至今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也很少再被人们关注。这是因为：

第一，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和身份限制，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等级的存在。但在现阶段，在市场经济国家本国公民权利平等和身份限制已经消失的条件下，城市化率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第二，如果某个国家至今仍旧存在公共服务因城乡而异，或存在城乡社会保障的非一体化，那么城市化率可以反映社会保障一体化方面尚存在的城乡差距。但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不多。

第三，由于国内交通运输条件的日益完善，再加上通信手段的方便，以及运输成本、信息成本的降低，土地价格地区差距的存在，所以城市化率高不一定反映工业企业必定趋向于集中，工业企业可能分散于城区以外的农村。

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但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的意见，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一些农民工虽然在城镇中已是常住人口，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城镇化率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有意义，这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程度的不足。特别是涉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更是如此，从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就更有迫切意义。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农民工状况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夫妇所生下的子女，现在都到了就业年龄，他们的身份仍是农民，但他们一直在城里生活和受教育，在就业时身份未变，择业机会少，就业也受歧视，通常的出路仍然是当农民工，结婚的对象也是农民工子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城乡一体化改革越是拖延，代价越大。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

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应当分为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这种新模式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作“就地城镇化”模式。根据我以前在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的调查，那里的农村把农民住房进行改造，把果品种植和加工业、猪的饲养和新品种猪肉的初步加工业等作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农村生活质量上看，已经同桂林市的城镇市民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就地城镇化”的一个例证。2012年11月末，我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所属的几个县进行考察。当地县级领导人介绍道，近几年来这些地方已经不声不响地实现了城镇化，没有大规模拆迁、搬家，农村的居民、小镇上的居民都感到城市和农村在生活上已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农村家庭收入和城里人的收入也没有多大的差距了。在嘉兴市的平湖、湖州市的安吉两个县级单位，农民反映：农村的水、电、路、学校、医院、社区服务同城里差不多一样了，有些家庭近距离地搬家，大家是情愿的，生活过得好，有什么不愿意的？这也是对“就地城镇化”的真实表达。

有些专家同意这三部分构成中国城镇化的设想，但仍有一个疑问，即老城区和新城区可以纳入城镇化的范围，但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范围，似乎有些不妥。他们说：如果把农村新社区纳入城镇化的范围，岂不是自相矛盾？难道农村与城镇可以合而为一吗？这个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此可以作如下解释：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开始时，甚至较长时间内，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还不能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还会继续存在，在这个阶段，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老城区和新城区都有常住的农村人口，农村新社区更不必说了，农民成为新社区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常住于新老城区的农民，迟早会转变为有城镇户口的居民。这是总的趋势，谁也无法改变。至于在农村新社区居住和工作的农民，随着新社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特别是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展，新社区中的农民迟早也会转为城镇户口。

说得更确切些，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城区和农村不再有居民身份的差别，也不再有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到了那时，可以把“农村新社区”改称为“新社区”，前面不必加上“农村”二字。反映中国城镇化真正特色和符合中国国情的，恰恰是“新社区”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社区”今后就是中国的新城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城镇化体现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阶段。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别和权利平等的目标。

摘自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书 摘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2期要目

决策要闻

习近平：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本刊策划

媒体深度融合（共5篇） 喻国明等

理论视点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对外开放思路 胡鞍钢

养老保险并轨改革：让养老保险向更公平方向迈进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本刊记者 胡秀荣

改革纵横

贯彻实施新预算法推进预算决算审查监督法治化 尹中卿

治党论苑

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张晓燕

热点观察

必须适应反腐新常态下的领导工作 丁晓强

观往知来

古代中国如何使用“智库” 何勇强 卢敦基